

辩证性·科学性·时代性

——重新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

黄 四 宏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摘 要] 鲁迅的翻译向来被视为“死译”、“硬译”。事实上,作为译者的鲁迅,在翻译活动中,总是认真地考虑读者对象、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诸因素,从忠实原文文本出发来确立其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科学的、辩证的翻译策略。更可贵的是他自觉地根据文化任务来选择翻译方法。因而客观地评价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十分重要。在文化日益趋向大融合的今天,鲁迅的翻译策略必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 鲁迅; 异化; 归化; 辩证科学; 文化任务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103-03

鲁迅,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以独特深邃的文学造诣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他积极投身于以“文学医民”的一生中,译介国外作品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以说,鲁迅的文学生涯及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和披荆斩棘的开拓者”^[1]、“中国科技翻译的先驱者”^[2],从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到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先后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近百名作家二百多种作品,译作三十余部,另有零篇七十余篇,约三百多万字。

作为一位如此多产的译介者,他的翻译方法自然备受关注,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他的翻译似乎是贬抑多于褒扬,于是鲁迅的翻译曾一度定性地成为“死译”的典型,“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之类的评语,把这位伟大的翻译家的翻译观一棍子打死。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重新审视先生的翻译方法,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辩证性和科学性。世界文化融合的趋势表明我们仅以方法论方法,就事论事地评价翻译家的思想只能误入偏颇。翻译方法的科学性评价应与译者的目的以及所处时代赋予的文化任务紧密地结合。

一 辩证的翻译观——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翻译首先是个双语转换的过程,过去人们过多地只注意到了较为明显的语言层次上的转换而采用“直译”、“意译”等说法。然而语言与思维、文化密不可分,双语转换更多的要涉及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无论译者是否意识到,这一层面上的转换都客观存在。因此,我们拟用“异化”“归化”代替鲁迅翻译观中的“直译”、“意译”之

说,以便能更准确地说明其中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3]。

(一)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

所谓“异化”是指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它能“把一种文化及语言中的信息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而贡献给另一种文化及语言”^[4]。在鲁迅的阐述及其译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化”是他采取的主要翻译手段。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容忍多少的“不顺”并不是消极的。首先,他的“异化”建立在忠实于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译作不能改变原文的“本相”,否则便“对不起作者”^{[5]273},即所说的“我是不主削鼻割眼的”^{[6]246},“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的‘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5]464}。显然,为忠实原作的思想和内容,为体现原文写作手法和风格,鲁迅选择了直译式的“异化”。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作为一名翻译人员,如果不把“信”摆在第一位,不管他的作品文字多么优美,也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同时,鲁迅指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7]225}。由此看出,他把翻译做为一种吸收新句法、输入新词、“丰富群众语言”的有效途径,让新词、新句法“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剥落在过去里。”^[8]无可非议,异化的这种用途是显而易见的。在词语上,“罢工”、“干部”、“主义”、“在××领导下”等在当时都被视为是不顺的,如今已是自如地被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常用的词语了,它们早已融入了中国的词汇,甚至看不到丝毫“异化”的影子了;在句法上,汉语中的共动和共宾,句子的延长,以及某些从句的后置等等都是

[收稿日期] 2008-08-10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20070396)。

[作者简介] 黄四宏(1978-),女,江西武宁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异化的结果。这一点在提倡白话文的当时,其贡献斐然,通过“异化”,鲁迅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得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的不甚精确的缺陷”^[9]。

另外,鲁迅指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6]246},即通过异化,可以增长见识,熟悉国外风俗人情,这说明鲁迅已意识到了翻译中涉及的文化问题。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文化内涵也不同,但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渗透性很强,“具有潜在的相互吸收和包容能力”^[10]。也就是说,异化能把国外的风俗习惯等新鲜的文化因子介绍进来,既能大开眼界,又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文化的融合。可见,鲁迅的异化也是基于文化层次上的考虑,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综上所述,我们就客观地看到,鲁迅所提倡的“直译”事实上是充分考虑到原作者、语言及文化三因素的“异化”,“不顺”,“死译”并非其本意所在。

(二) 归化为辅的译法

与“异化”相对,“归化”即是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鲁迅的翻译策略并非单一的“异化”,其“归化”思想往往被人忽视。孙致礼说过,“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争取异化,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则应退而求其次,进行必要的归化。”^[11]其实,这也正是鲁迅翻译策略的真实写照。

在《〈艺术论〉小序》中,他认为,“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成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5]295},这足以说明他对“归化”的态度。在实际翻译中,对那些很“繁复曲折”的文体,也会“偶有减省,如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一曲之类”^{[5]291}。他的“归化”译法,更多地在其对人物名的译法中体现出来,“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相反,人物名却意译,因为它是象征”^{[5]258}。在《记剧中人物的译名》中,鲁迅列举了译植物名时的六种译法,从中我们得之,他尽量以中国已有的名称为先,其次才考虑“译西洋名”。

总之,鲁迅始终提倡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辩证的翻译方法,承认两者的区别,也尽力把两者结合起来,“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6]246},“兼顾”一词,充分说明鲁迅并未把“归化”“异化”割裂、对立起来,而是极力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翻译方法的科学性以及时代性

那么,鲁迅是如何处理“归化”“异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从他对译文读者,原文体裁的考虑以及时代特征分析其辩证翻译观的科学性。

(一) 译文读者群

鲁迅认为译书时,“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7]224}。他把读者“粗粗”地分为“很受教育的”、“略能识字的”两类。针对不同的读者,应采用不同的译法。对于前者,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译法,即以异化为主,而“不顺”并非不合情理,而是“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读者,鲁迅相信他们的接受能力。接受理论表明,译文读者对译文能够发挥充分的主观能动性,“有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12]。而对于第二类读者,鲁迅认为

至少是“改作”,同时也应该适当地用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但“不宜太多”^{[7]225}。“打仗必先搞清楚敌人是谁,策划广告攻势先定明目标与对象;翻译工作也要知己知彼,每次预先明确界定读者范围。”^[13]通过对读者群的分析,鲁迅科学地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使自己的方法日渐成熟和完善起来,以更好地“引导读者接受异族文化”^[12]。

(二) 原文文本的体裁和译者的目的

鲁迅译介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性的和普及性的。前者如写实主义作品以及理论书籍,后者如童话、小说等。对于第一类,鲁迅常把自己比做是“窃火给人”的革命者 Prometheus。在《〈文艺政策〉后记》中,他指出,“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5]309}。可见,他认为中国有些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对理论所知不多,有必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理论知识,因为“这些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5]307}。由此,鲁迅怀着这种以理论“新兴”中国文学的革命思想,不惜以少许的“不顺”为代价进行“直译”,以“以竭力保存原书的口吻”。

对于第二类,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提到,“第一是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5]396}。显然,这类译文译者多采用“归化”,力求通俗易懂,让孩子们“不断的发荣滋长”。要达此目的,对于不满意之处,先生甚至“再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14],读者看得“不费力”。

可见,鲁迅始终辩证地看待作品的翻译,紧密结合原文文本的体裁以及内容的侧重点,明确翻译各类文本的目的,选择适宜的翻译法,以求更好地以翻译为改造社会服务。

纵观鲁迅先生的译著,学术性的内容占主要地位,因此就其总的翻译方法来说,仍是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三) 时代特征

中国近代史上,面对着内忧外患,有志之士一直在努力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统治下,国家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国民麻木不仁,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亡。于是挽救民族危亡便成了时代的主题。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便是这一主题的体现。要建立新文化,途径之一便是引进世界先进文化,改造国民思想。由此,翻译便自然地受制于中国人“救亡图存”、改造文化的决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鲁迅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活动必须服从于文化任务,于是毅然走上了以“异化”为主的译介之路,把翻译作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的武器,一方面要批判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痼疾,一方面要介绍引进外国文化的精髓和新因子。“严格说来,中国人通过改造后的翻译作品永远无法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貌,也就难以吸取它的精髓。”^{[15]29}。

通过“异化”外国理论著作和写实主义作品,鲁迅向其寄予厚望的“战斗者”们展示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中国的人心,鼓舞了民众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建立新文化的决心。毫无疑问,鲁迅是在自觉地肩负着这一

文化转型期的历史任务,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活动为工具,“帮助中国人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15]30},他的翻译方法和实践顺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 几点启示

鲁迅先生以民族文化的振兴为己任,顾全大局,积极地投身于大量的翻译活动,为中国20世纪的翻译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从忠实原文出发,通过对翻译中主体(译者)目的、读者对象、文本类型、文化需求等因素的认真分析,合理地采用了科学的辩证的翻译策略。他的“异化”为主的翻译方式和实践让国内读者领略到了“外面的世界”,唤醒了沉睡中麻木的民族,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有力的强心剂,堪称“近代翻译史上的革命,是中国引进外国文化的里程碑”^{[15]3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先生的翻译方法必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其一,如何正确评价译者。翻译活动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它不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代替。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有一定的主动权,他可以根据自己从事这一活动的目的,针对读者的接受能力选择自己的翻译策略,从而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任务。因而,我们评论译者时,不能死死盯住其语言是否自然,顺与不顺,而应从宏观处着眼,结合译者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考察译者的目的,以及文化交际的任务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做出历史的辩证的评价。

其二,新时期翻译策略。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的范围愈来愈广,这一切必将促进文化的大融合。这一趋势,使“人们对新异的东西的渴求”会不断地加强。同时,中国加入WTO,客观上要求全面了解世界文化,吸取人类文化精华,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期即将到来,译者,肩负着文化交际的重任,应该顺应这一文化大趋势,“胸怀宽阔地去阐释介绍异域文化,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贡献”^{[16]96}。昔日遭人白眼的直译式的异化,在当前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将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16]98}。

[参考文献]

[1]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

- 出版公司, 1989: 65.
- [2] 费振玠, 曹 沈. 论科技翻译的先驱—鲁迅[M]//方梦之. 译论纵横.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3: 320.
- [3]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2 (5): 25.
- [4] 谭惠娟. 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中国翻译, 1999 (1): 46.
- [5]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0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273.
- [6] 鲁迅. “题未定”草[C]//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246.
- [7] 鲁迅. 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C]//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225.
- [8]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97.
- [9] 刘全福. 兄弟携手 共竞译业—我国早期译坛上的鲁迅与周作人[J]. 中国翻译, 1998 (4): 52.
- [10] 黄东琳. 文化渗透与语言异化需求的变化[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18(1): 112.
- [11] 孙致礼.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 山东外语教学, 2001 (1): 34.
- [12] 陈丽莉.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中国科技翻译, 1999, 12(2): 43.
- [13] 周兆祥. 翻译与人生[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78.
- [1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51.
- [15] 雷亚平, 张福贵. 文化转型: 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J]. 鲁迅研究月刊, 2000 (12): 29.
- [16] 杨才元. 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J].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3): 96.

Revisiting Lu Xun's Translation Strategy

HUANG Si - ho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Abstract: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was once regarded poor and mechanical. In fact, what he adopted was the scientific and dialectic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supplemented by domestication” after analyzing carefully various factor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process. Moreover, he made his translation meet the cultural demand at his time. Therefore, we should know how to assess a translator's method objectively. Today, at a new stage of cultural melting, Lu Xun's translation strategy must give us mor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Lu Xun;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dialectic and scientific; cultural task